

以小見大，見微知著：讀金國平《“中國大帆船”與“絲銀之路”——“Parián”研究》

葉農 韓天歌



學術之研究，可以宏觀敘事，作理論之創新、範式之創建；亦可以微觀探究，作史實之考訂、遺珠之串聯。宏觀敘事，需要學者有開闊之視野，邏輯之思辨；微觀探究，需要學者具敏銳之眼光，精深之學力。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推進學術之演進、研究之深入。金國平的研究即為如此，他堅持從微觀探究着手，把注意力放在了其他學者不太注意而對研究卻很重要的“小問題”上，這些“小問題”能為歷史研究提供有力的證據。

金國平從小師從西班牙共和黨人“貝貝”（José Castedo Carracedo）學習西班牙語。大學畢業後，學校又安排他去改學“一種兄弟語言——葡萄牙語”，金教授幽默地自稱：拔掉了“西班牙”，裝上了“葡萄牙”，使之“不費吹灰之力練就‘二牙功’”。通過對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文獻的整理、爬梳和翻譯，並與中文文獻進行比勘，一些學術研究中的難點、疑點就能夠迎刃而解。再加上其對與之相關的法文、意大利、英文的瞭解，因此，他擁有了全面佔有研究基礎——文獻的能力，這一能力是許多中外學者所不具備的。

憑藉着強大的語言能力，金教授一直在多語言綜合研究領域中奮力前往。數十年來，其涉獵的領域包括歐洲海外擴張史、葡萄牙史、澳門史、天主教傳華史等。其著作《“中國大帆船”與“絲銀之路”——“Parián”研究》的問世，標誌着他又開闢了一個新研

作者簡介：葉農，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韓天歌，暨南大學文學院古籍所博士生。廣州 510632

究領域，即中西關係研究，他指出：“考慮到葡西兩國在 1580 年到 1640 年期間，共事一主，即所謂‘二元君主’時代，兩國歷史多有交叉與重疊，且這一歷史事件影響到中國與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交往史，進而也影響到了澳門史和世界史，所以，我把幾十年來陸陸續續寫的有關這個時期的拉丁美洲、葡萄牙、西班牙、澳門和菲律賓的文章搜集了一下，又刻意動手寫了幾篇以西班牙語原始圖文資料為基礎，與之有關的論文，結集出版。”^① 現按該著作章節分述簡評如下：

（一）白銀入華與澳門開埠

以澳門開埠原因來看，長期以來學界對澳門開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龍涎香、佛郎機和自鳴鐘三大商品之上，^② 但是著者提出，澳門也是白銀流入中國的重要通道。若要分析澳門開埠，白銀就是繞不過去的話題。大量的白銀通過澳門流入中國，促成了中國貨幣白銀化進程，進而推動了中國的稅制改革，從實物稅過渡到貨幣稅。

雖然學術界對於白銀輸入中國的問題展開過許多研究，就澳門的海上貿易與白銀入華的課題上，就內地學者的研究而言，據中國知網的統計，計有紀宗安〈十六世紀以來澳門在太平洋大帆船貿易網中的作用與地位〉（《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99 年第 6 期）等 20 餘篇論文，還有一批如劉珣、王軍《明清時期中國海上貿易的商品（1368—1840）》（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3 年）等學術著作出版，此外，台灣、港澳地區，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學者，如鄭永昌〈中日有關明代白銀史研究之回顧〉（《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992 年總第 20 期）、梅新育〈明季以降白銀內流及其對中國經濟制度之影響兼論澳門在其中的作用〉（《文化雜誌》1999 年總第 39 期）等，也曾對此問題展開過研究，也取得相當多的成果，但這些成果多關注白銀在澳門海上貿易中的作用，並未如本著那樣抽絲剝繭，提出中國需要白銀才是中國政府允許葡萄牙人入居澳門最為重要的原因的觀點。

既然要研究白銀，就不得不研究流入中國的白銀的幣名和面值。而著者首先根據銀幣的鑄造技法不同，將銀幣分為多個幣種。隨後又引用了《瀛涯勝覽》、《呂宋記略》等多部明清人著作，結合著者對西班牙語，以及閩南、廣東地區方言的瞭解，將西班牙流入中國的銀幣命名為“八單位王幣”，因為當時的西班牙貨幣採取的是“八進位值制”。這種銀幣成色固定、面值固定，而我國傳統的銀兩則有着成色不同、重量不等的問題。因此“八單位王幣”很快就取代了我國傳統銀兩，在商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最後，著者引用了《通商字匯》、多份〈華工出洋合同〉以及明清時期的文章，結合著者對西班牙人文歷史的瞭解，將“八單位王幣”分為柱幣和胸像幣兩種。

^① 〈“獨牙功”⇒“二牙功”〉，金國平：《“中國大帆船”與“絲銀之路”——“Parián”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廣州：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2022 年，頁 18—19。

^② 〈澳門與美洲白銀——流入中國之西班牙美洲幣名論考〉，金國平：《“中國大帆船”與“絲銀之路”——“Parián”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廣州：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2022 年，頁 3。

通過一枚入華銀幣，澳門流入中國的銀幣幣名和幣值究竟為何這一重大問題得到解答，同時解答了“八單位王幣”何時出現、以及何時在中國大範圍流通兩個問題。

（二）海上絲銀之路與泛太平洋航線

著者在〈1584—1585：澳門—阿卡普爾科首航〉中回答了三個重要問題：第一，橫跨太平洋、連結歐洲、美洲和亞洲的“泛太平洋絲銀之路”的具體路線以及其是如何產生的？第二，“馬尼拉大帆船”和“中國大帆船”有何聯繫？第三，泛太平洋航線是絲綢之路還是絲銀之路？

首先，著者提出了一個學術界所未曾涉及的全新概念——泛太平洋絲銀之路。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絲綢之路”，因為這條航路是通過東運絲綢，跨越太平洋，換回白銀西運的，是名副其實的“絲銀之路”。

其次，著者以時間為線索，介紹了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兩個國家為開通“泛太平洋絲銀之路”所作出的努力。經過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埃爾南·科蒂斯（Hernán Cortés）、洛佩斯·德·維亞洛博斯（López de Villalobos）等多位航海家共同努力，1565年，西班牙航海家安德列斯·德·烏達內塔（Andrés de Urdaneta）率領艦隊兩次由西向東跨越太平洋，開闢了“烏達內塔航線”，其主題航程是菲律賓馬尼拉（Manila）—墨西哥阿卡普爾科（Acapulco）。

在東太平洋，船隻從阿卡普爾科啟程返回歐洲。而在西太平洋，“烏達內塔航線”以馬尼拉為中心，開拓出了馬尼拉—香料群島、馬尼拉—福建和馬尼拉—廣州、澳門的三條支線。而隨着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線的開通，亞洲、歐洲和美洲正式被連成一體，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開啟。此前只能由歐洲—亞洲之間或歐洲—美洲之間的航海和貿易，只能被視為“半球化”。

在研究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線的重大意義和開通過程之後，著名航海家佛朗西斯科·加利（Francisco Gali）便進入了研究範疇。著者檢索與分析了多個版本的加利航行日誌和藏於英國格林威治博物館（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的航海地圖，對比了葡語和英語的各種異同，最終考證出了加利于1584—1585年率先開闢了澳門—阿卡普爾科航線。此後，還有佩德羅·德·烏納穆諾（Pedro de Unamuno）等多位航海家進行了廣州—澳門—阿卡普爾科的航行。最終得出結論，泛太平洋絲銀之路在中國的始發點，正是澳門。

最後，著者根據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結合深厚的語言學知識，提出“馬尼拉大帆船”應該被叫做“中國大帆船”的觀點。而且還使用了清朝張蔭桓撰《三洲日記》和葡萄牙文獻中記載的漳州領水員言論，推斷出了西班牙和中國展開雙向溝通的大約時間。雖然西班牙人開創了中西通航的航路，但實際上沒有中國領水員的幫助，這些航路的開闢恐怕不會如此順利；而且如果沒有中國的大量商品，商業回航也是不可能維持的。這

對於目前中國所宣導的“一帶一路”也有很強的現實參考意義。

（三）“化人”與西葡

中文文獻中所稱的“化人”、“化人番”究竟為何國人？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在中文文獻中的稱呼為何？雖然說，學術界一般認為是指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但這些稱呼的中文詞源，卻是有待釐清的問題。本著〈“The Selden Map of China”中“化人”略析——兼考“佛郎機”與“佛郎機國”〉一章，從不同文獻中找到了新史料，說明此問題，並提供了其論證的過程。

該文以英國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珍藏的〈明代中葉福建航海圖〉為切入口，對該圖上的註釋“化人”和“化人番”進行了考據。中文文獻中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統稱為“化人”或“化人番”，但是也應當進一步考證為何將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個不同的國家用同樣的稱呼表述，以及兩者之間有何聯繫。

在參證了清代江日昇撰《台灣外記》、徐繼畲撰《瀛寰志略》和黃毅軒撰《呂宋紀略》後，本著得出結論，即“化人”正是“佛郎”的音譯。通過關於閩南方言的瞭解，著者指出“化人”本是“番人”之意，只因閩南方言中“番”與“化”發音相近，因此才產生了“化人”的說法。

著者接着指出“佛郎機”這一說法的濫觴是阿拉伯語中的“franj”，泛指天主教歐洲。中世紀時，阿拉伯人入侵歐洲，被歐洲聯軍擊退，因此“佛郎機”名聲大振。蒙古西征時期，蒙古軍隊利用阿拉伯人作為翻譯，因此也將“佛郎機”一說帶到了中國。

本著通過多篇西班牙籍傳教士的著述，指出西班牙傳教士也自稱“佛郎機人”，推斷出“佛郎機”一詞並無貶義，推翻了傳統的觀點，而此前大量學者認為“佛郎機”是中國對西班牙、葡萄牙人的蔑稱，並認為需要對《明史》開展新的箋證工作：“《明史·佛郎機傳》與史實多有出入，存在張冠李戴現象。此傳為唯一涉及澳門的‘正史’，雖有前賢的數種考證，似乎有必要集合澳門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展開一項新的箋證工作。”^①

（四）琉球島群與福爾摩沙

葡萄牙人在澳門開埠前抵達日本的航線是怎樣的？著者從2007—2018年耗費十餘年的時間研究，引用了多位航海家撰寫的航海日誌、多個年代和版本的航海圖以及西班牙國家歷史檔案館內的多份文獻檔案，對航海圖中所出現的多個地名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考證。著者認為，葡萄牙人用“小琉球”來稱呼和標記台灣島，主要是因為其受到了中國地圖和來自閩南地區的舵手的影響。著者通過約1512年繪製的航海圖、1542年繪製

^① 〈“The Selden Map of China”中“化人”略析——兼考“佛郎機”與“佛郎機國”〉，金國平：《“中國大帆船”與“絲銀之路”——“Parián”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廣州：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2022年，頁54。

的《世界島嶼總圖集》等文獻，將西方地圖對台灣島的標記年代大大提前。

接着，著者又就“os Gores”一詞的來源進行了分析，考慮到琉球群島實際上是中國、朝鮮和日本往來的海上中繼站，因此該詞的來源非常複雜。

經過複雜的研究和論證，著者指出，由於當時的航海資料不完善、早期中國地圖對台灣島的繪製也存在問題，因此葡萄牙航海家對台灣島的地形產生了錯判，致使長期以來，葡萄牙航海家都不清楚“小琉球”和“福爾摩沙島”實際上同為一個島嶼。^①

（五）“Sangley”與“生理”

“Sangley”一詞的諸種指稱研究，體現了著者在歷史學和西班牙語上的造詣。通過引用少見的西班牙商人阿維拉（Bernardino de Ávila Girón）手稿中出現的漢字“生理”，因而得出了“sangley”一詞來源於漢語“生理”的結論，成了一大重要貢獻。

著者理清了“sangley”一詞的詞義變化軌跡。在第一階段，西班牙人將華僑介紹本人身份來源地的名字當作了國名，使用“sangley”一詞來指代中國。第二階段，西班牙人將“sangley”用其來代指在居住在菲律賓的華人華僑。第三階段，“sangley”也被用於代指操閩南語的商人。到了第四階段，“sangley”被用於代指廣義上的商人，不管其是否使用閩南語。

（六）“Parián”與“澗”

在明史、福建史、華僑華人史、中國—西班牙關係史和中國—菲律賓關係史裏，中國人在菲律賓早期居留地的中外名稱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幾乎文必稱“澗”^②和（或）“Parián”。中外學者鑑於其歷史的重要性，許久以來，對它們的含義、指稱及對譯均有涉及和敘述，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本著中，著者考證了菲律賓語言中的“Parián”的意思和來源。傳統觀點認為，“Parián”一詞的意思是“澗內”，即唐人街。但是著者憑藉其對西班牙語的認識，提出不論是“China”還是“Chino”，都是無法和“澗內”勘音的，“Parián”一詞的真實含義應當另有其意。

著者首先研究了大量中文手稿，得出“澗”字有着毗連地塊、街區、街市和自然村落這四種詞義。接着又參考了大量的西班牙文和菲律賓文手稿、著作與地圖，得出“Parián”一詞等於西班牙文的“Alcaicería”，意為“大集市”、“大市場”。

根據馬尼拉華人社區變遷的四個階段，著者指出，由於兩個多世紀來，菲律賓華人

^① 〈從中、西航海資料探索“Os Léquios”（琉球島群）、“O Léquio Pequeno”（小琉球）及“A Ilha Formosa”（福爾摩沙島）〉，金國平：《“中國大帆船”與“絲銀之路”——“Parián”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廣州：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2022年，頁82。

^② “澗”字是“澗”字的最早書寫形式，在已知文獻中首次出現在1598年菲律賓華商書寫的文書內，參見〈“Parián”：文征圖證考“澗”源〉，金國平：《“中國大帆船”與“絲銀之路”——“Parián”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廣州：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2022年，頁98。本著中初次使用“澗”字並無其他註釋說明。

的聚居區一直被稱為“Parián”，儘管 18 世紀後期，西班牙殖民者廢棄了“Parián”，用“Alcaicería”這種商住兩用的方式將其取代，但是“Parián”一說仍然流行了下來。

“Parián”，除了用來形容菲律賓華人聚居區之外，還被用於形容菲律賓日本人、菲律賓馬來人的聚居區。同時，西班牙殖民者還在台灣島雞籠、淡水等地設置了“Parián”，用於管理當地民眾。甚至在墨西哥，西班牙人也設置了“Parián”，尤其以墨西哥城中心廣場的“Parián”最為知名。而在漢語中，“Parián”則有更傳統的稱謂——“大明之街”或者“大明街”。即今日風行世界的“唐人街”。

著者提出，馬尼拉的“壩”很有可能是亞洲乃至全世界出現最早的商住兩用的批發零售商業中心，是中國前往美洲、歐洲的貨船的商品集散地。

（七）“刺桐”與泉州

以大航海家哥倫布（Cristóbal Colón）閱讀和批註過的《馬可·波羅遊記》（*Il Milione*）為切入點，著者首先指出了哥倫布出海航行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尋找“Zaitun”。而經過前人的研究和討論，目前學術界已經可以確定，“Zaitun”便是“刺桐”，位於我國泉州。

首先，考證了“Zaitun”和“Satin”兩個詞的來歷和兩詞在西方的發源與變遷，又介紹了泉州在對外貿易方面的卓越成就。而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將泉州描繪為一個富庶、繁榮的國際港口城市，這在歐洲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大量歐洲貴族和航海家被書中描述的泉州的財富所吸引，刺激了大航海運動的發展。

其次，列舉出了三幅 14—15 世紀的西方航海圖，進一步證明了哥倫布是為了尋找“刺桐”，才頻繁出海航行。雖然《馬可·波羅遊記》的真偽一直存在爭議，但是其產生的社會效應和歷史作用卻遠遠超過了其本身。

（八）龐氏信函與菲島慘案

著者在此之前，主要論述語言、地圖之上的詞句來源和變化，而在本著作最後一章〈明政府對“1603 年慘案”態度諸因素之新探——以傳教士龐迪我 1605 年二函為中心〉卻筆鋒一轉，透過西班牙籍耶穌會神父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的兩封信函，探討馬尼拉著名的屠殺華人的慘案，敘述事件經過，分析事件原委，豐富了論證角度，使得讀者既可以從器物、詞句中看出中西關係的發展，也可以從具體事件中瞭解中西關係的波折。

1603 年慘案又稱“大侖山慘案”，是該年西班牙殖民者對菲律賓華商發動的一場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在屠殺之後，西班牙殖民者和菲律賓殖民當局萬分驚恐，擔心明朝政府派兵前來問罪，或者直接切斷中國與菲律賓的貿易以進行制裁。然而明朝政府卻無動於衷，僅發表了一份詔書譴責了西班牙殖民者的罪行，便表示不再追究此事。

為何明朝政府會縱容西班牙殖民者屠殺華人呢？關於這一問題史學界進行了長期研究。而著者則引用了未曾刊載的傳教士龐迪我所撰寫的〈龐迪我於1605年3月4日從北京致馬尼拉耶穌會總院院長葛列格里奧·洛佩斯神父函〉和〈龐迪我於1605年3月6日從北京致耶穌會菲律賓副省會長迭戈·加爾西亞函〉兩篇文章，嚴密分析了明朝政府對於1603年慘案無所作為的原因。

龐迪我在兩份函件中介紹，當時明朝朝廷上的確有官員提出，明朝應當派兵問罪。但是首先，明軍需要渡海作戰，可是中國卻沒有如此多的大型船隻運載大批軍隊。第二，雖然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不多，但是可以聯合日本人，對福建進行騷擾。那麼為何明政府不終止對菲律賓的貿易呢？因為福建人多地少，大量福建人靠出海貿易為生，如果切斷貿易，就等於斷了大量福建人的生計，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此外，明朝政府也可以從對外貿易中獲得大量商業稅，因此也不願意切斷貿易。在附錄中，本著還引用了〈諭呂宋檄〉和《島夷傳》等史料，介紹了1603年慘案的具體情況和明朝皇帝拒不派兵問罪的原因，與龐迪我的兩篇文章相互印證。

[責任編輯 陳超敏]

[校對 羅愛華]